第六章：
城市經濟學

1. 從 Romer 看香港之死

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Romer（另一得主為 William Nordhaus）和香港有不少的淵源。他和香港大學前首席副校長王于漸是同窗，均師從芝加哥大學的Robert Lucas（1995年諾獎得主）。而根據香港科技大學教授雷鼎鳴的憶述，Romer在十年前離婚之後，曾一度有意來港任教。他其後提出「特區市」（charter city）的概念，亦主要以香港和深圳為藍本。

大芬村的群聚效應

無獨有偶，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，傳媒有不少回顧和報導。其中深圳大芬村的故事，又再重新進入我們的視野。早在1980年代末，一名香港油畫商人在當地開設大型工場，高峰期曾聘用多達200名畫工，從事薄利多銷的油畫出口生意。最終令原名大糞村的大芬村，一舉發展成舉世知名的油畫村，聚集全國數以千計的畫家畫工，產業鏈的分工亦愈見精細。它是深圳經濟奇蹟的一個縮影。

雷鼎鳴在《幫香港算算賬》（2011）一書中，亦有提到大芬村的經驗。他指受惠於全球化和自由貿易，市場分工得以高度專門化，產業群聚的集中形成「規模效應」（economy of scale），「在小小的不到半平方公里的地方，匯集着世界大部分油畫的生產」。此舉亦吸引了大批專門人才，讓彼此從「從實踐中學習」（learning by doing），迅速帶來技術和產品質素的提升。

雷鼎鳴進而指出，大芬村的成功經驗， 正好印證了 Romer 著名的「內生增長理論」 (Endogenous Growth Theory)。他又認為，香港應借鑑大芬村的經驗，重拾多元創新求變的發展動力。由 Romer 模型衍生的創科產業群聚，不但在學術界舉足輕重，同時對各國產業政策影響深遠。現時遍佈全球的科技園區、創業園區和「新矽谷」，無不信奉人才和技術的地理空間滙聚，是加速產業升級的成功方程式。直至今天，特區政府仍對數碼港、科學園、新田科技城等設施趨之若鶩。毋庸諱言，除了「北部都會區」和「明日大嶼」人工島外，創科投資亦是林鄭月娥任內另一巨大創舉。

正如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Paul Krugman 的回顧指出，內生增長理論無疑曾紅極一時，Romer 更彷彿是當代經濟學的新奠基者。但相關模型其實並沒有通過嚴格的學術檢驗，「當中涉及太多的假設，試圖說明一些無法量度的東西，是如何在影響另一些無法量度的東西」（too much of it involved making assumptions about how unmeasurable things affected other unmeasurable things）。它曾一度大受歡迎，只因提出了一些大家愛聽的說法；但作為一個學術泡沫，卻早已如對知識型經濟的迷信般，大幅貶值。

Romer 年年都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熱門人選，2016年10月，更曾鬧出紐約大學誤報他獲獎消息的大笑話（和《星聲夢裡人》「奪得」奧斯卡最佳電影不遑多讓）。到2018年諾獎評審終於親自致電恭賀，亦算是對內生增長理論遲來了20年的肯定。

特區市的爭議

Romer 近年提出「特區市」的概念，則主要是針對落後國家的發展困境，建議劃出一片沒有人居住的地區，建立規章制度迥異的全新城市，並委託發達國家為代理進行管治。落後國家人民則可自發搬到這城市，自願參與新制度創建的實驗。此舉將有利於以特區市作為試點，逐步引入新的發展模式，避免落後國家過早及全面遭受改革的衝擊。顯而易見，香港和深圳正是特區市的典型。

Romer的建議在政治上極具爭議性，因為具有濃厚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色彩。若單純從經濟學的角度，則這種刻意打造的新城市和規章制度，固然有較大機會擺脱主權國的政治及政策束縛，較易容納新意念和新產業的出現；但它始終是個自上而下規劃的城市，欠缺漸進演化和自然更替的過程。由此帶來所謂新的發展模式，難免仍具有「堅離地」政治工程的意味。

不難理解，不少對特區市持反對意見的人，均會借用 Jane Jacobs 的觀點，指出城市擁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氣質，是個「混雜流動、間或無序」的生命有機體[註一]。就算是香港作為一個移民城市，亦有賴本土身分文化的漫長和漸進磨合，市民真正融入和共同擁有這地方。假如只片面輸入所謂的技術人才，以「搵快錢」心態建立市場優勢，則縱能打造出金堆玉砌的產業王國，亦只是欠缺活力和生命力的冰冷空間。

後記：在上文剛寫好之際，忽見王于漸〈具雄厚無形資本經濟體的管治政策〉（《信報》，2018年10月31日）一文，內容同樣提及 Romer 和 Jacobs，讀者大可自行並列對讀。不過文中提到「明日大嶼」人工島，竟用上 Jacobs 作為佐證，指正好提供密集發展的都市環境云云，實在極盡指鹿為馬、九唔搭八之能事。Jacobs 若泉下有知，相信必定氣得彈起身來。

說穿了，人工島正是典型的特區市 ，一座沒有歷史和靈魂的僵化空間，一種迷信人定勝天的全方位規劃。它是彷如外星飛船從天而降的新城區，完全不尊重城市生態的特有規律，漠視城市經濟隨機迸發的巨大生命力。假如 Jacobs 是真誠確信多元開放的市場競爭，則王于漸所推崇的，骨子裡正是國家資本主義特有的「國進民退」，卻竟能披上新自由主義的包裝示人。香港荒旦無稽之事甚多，但極少能超出這種水平。

註一： 在此借用：Wong Yui Chim (2013) Diversity and Occasional Anarchy: On Deep Economic and Social Contradictions in Hong Kong.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.

2. 人力資本：Glaeser、Lucas 和 Jacobs

Glaeser 和《香港2030＋》

看《香港2030＋》策略規劃諮詢文件，不禁想到 Edward Glaeser 的《城市的勝利》（Triumph of the City: How 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, Smarter,

Greener, Healthier, and Happier，2011）一書。對城市研究稍有認識的讀者，相信對 Glaeser 的名字不會感到陌生。這位哈佛大學城市經濟學家，正是當代最著名的「集約型城市」（compact city）倡議者。

Glaeser 在書中提到底特律著名的失敗例子。面對傳統重工業的流失，當地市政府不斷大興土木，力圖通過大型基建來重振經濟。但公帑投資卻如泥牛入海般，完全無法挽回底特律衰敗的命運。Glaeser 一語中的地指出：城市最重要的不是硬件基建，而是軟件制度，能為人提供自由開放的交流互動空間，但規劃者卻往往忘記這簡單的道理——這難道不正是當下香港的寫照嗎？

《香港2030＋》提出集約型城市、公共運輸導向的發展、智慧、環保及具抗禦力城市等嶄新概念——但其實也不那麼新，因為它們原是香港長期行之有效的發展策略。問題是當政府大肆宣揚，到底是進一步改進該等策略，抑或只是掛羊賣狗、口惠而實不至呢？

對 Glaeser 來說，規劃的首要任務乃是促進人的聯繫和互動。在資訊科技空前發達的年代，人反而愈益湧進擠迫的市中心——面對面的緊密接觸，仍是人最需要、而集約型城市最能提供的便利，最有利於城市的不斷創新、演化、改進和提升。多元化的交通系統、混合功能的社區、方便步行、縱橫交錯的街巷網絡，均是成功的要素。

但請看看我們的《香港2030＋》，請看看那些新市鎮發展的構想圖：僵化的分區規劃，千篇一律的石屎森林，連綿不斷、不見天日的巨型商場結構，大而無當、人跡罕至的市鎮公園和公共空間，切斷而非連接街道的鐵路系統等等——所有過去在天水圍找到的規劃失誤，皆悉數在未來新市鎮中繼續找到。

問題實在簡單明白不過：在西方，集約型城市原是解決城市過度擴張（urban sprawl）的工具；但在香港，它卻變成了促進城市過度擴張的工具。

Porter、Romer 和 Jacobs

我最早認識 Glaeser 的名字，並非源於《城市的勝利》一書，而是他合著名為 "Growth in Cities"（1992）的成名作。文章引用美國1956-87年170個城市六大工業的數據，以測試 Michael Porter、Paul Romer 和 Jane Jacobs 關於城市發展的理論假說。其中 Porter 著名的「競爭優勢論」，提倡單一行業中小企業雲集的「群聚效應」（clustering effect），廿多年來成為不少國家的政策藍本；Romer 則強調單一行業具壟斷性的龍頭企業，在帶動發展中扮演的領導角色；只有 Jacobs 強調多元混雜的產業結構，百花齊放、不拘一格 ，才是帶動城市飛躍發展的真正動力。

Glaeser 等人的研究明白無誤地指出：競爭比壟斷市場的效果為佳，多元則較單一的產業結構優勝。在這場著名的理論測試中，Romer 處於下風，Porter 僅屈居次席，Jacobs 大獲全勝。自此之後，Glaeser 一直奉 Jacobs 為理論啟蒙導師。

相信對城市研究稍有認識的讀者，亦肯定對 Jacobs 的名字絕不陌生。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、一個僅有高中學歷的記者、建築和規劃專業的門外漢，Jacobs 竟能全憑一己之力發起社區運動，對抗紐約規劃部門的主管 Robert Moses，徹底扭轉了格林威治村舊區的命運。然後，Jacobs 寫下了《美國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》（1961）一書，這部徹底改變城市規劃和都市更新觀念、甚至堪稱二十世紀美國最具影響力著作之一的巨著。

時至今日，甚具地方特色的格林威治村，已成為市無人不識的紐約市地標，國內外遊客必到的蘇豪區景點。區內舉目皆是四、五層高的古典平房，現已遍佈各類工作室和文創產業，成為紐約以以整個北美的時尚寒暑表。Jacobs 的舊居位於赫德遜街555號，她當年正是從閣樓的窗戶往外望，把混雜繁盛的街道生活描繪成「行人道上的芭蕾舞」（sidewalk ballet）——這已成為城市研究者最常引用的金句。

問題同樣簡單明白不過：香港喜歡宣揚自由競爭的理念，但骨子裡卻信奉 Romer，對單一行業壟斷的局面照單全收。

Lucas 和 Jacobs

Glaeser 最早接觸 Jacobs 的著作，乃是1980年代末在芝加哥大學唸博士的時候、Robert Lucas 教授的課堂上。這位199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，實堪稱芝加哥學派的掌門人，在他1988年一篇關於人力資本、廣為傳誦的重要論文"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"中，卻罕有地挪用了 Jacobs 的想法，強調人力資本的集體累積，以及知識轉移的「動態界外效應」，對城市發展舉足輕重的作用。

Jacobs 的《偉大城市的誕生與衰亡》無人不識，但其城市經濟學著作《與珍雅各邊走邊聊城市經濟學：城市，是經濟發展的溫床》（The Economy of Cities，1969）和《Cities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》（1984），卻一直鮮為人知。直至1988年 Lucas 在論文中直言，其理論乃深受 Jacobs 的啟發，遂得以解開了困擾經濟學家的創新增長源頭之謎，"New Growth Theory"、"dynamic externality"甚或"Jacobs externality"等述語便不逕而走。

問題卻在於，Lucas 對 Jacobs 的理解，卻極盡斷章取義甚至是蓄意歪曲，硬搬亂套在他的新古典主義和微觀經濟學論述中，而忽略了 Jacobs 所真正重視的產業結構演化的過程。Lucas 強調人力資本的投資，如教育及技術水平的提升，除有助提高個人的生產力和收入外，亦啟動了人與人之間相互學習和模仿。這些無疑都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，但卻對 Jacobs 焦點所在的市場動態適應機制（真正的 mechanics ！），竟完全不置一詞。

問題亦是簡單明白不過：主流經濟學家不願觸碰敏感的市場及產業結構問題，便把所有事情都說成是教育和人才的問題，包保沒有錯！

香港和「富人的尷尬」

然而，正如她的成名作早已預視的，Jacobs 不但關心城市的飛躍發展，也更關心城市的衰落和消亡。 除了因為戰爭或天災等極端情況外，一般來說城市的衰亡皆並非由外力造成，反而更多是受到內在消極因素的影響。創新和即興創意的良性循環之所以被打破，令城市的發展無以為繼，主要禍根包括囿於過去的成功經驗，拒絕淘汰過時和失去競爭力的產品。尤有甚者，是既有產業取得規模和制度上的優勢，刻意阻撓新的創新調整進程。

對此 Jacobs 更提出「富人的尷尬」（embarrassment of the riches）的獨特見解，指出城市達到一定的發展水平後，已經累積了大量財富，卻無法找到（更確切應是刻意排斥）新的投資機會。「財富唯有用於大量炫耀性和形式化的事情上，包括進口一些昂貴但沒用的產品，推動一些沒有社會效益的基建項目，又或利用大筆公帑投入短期救濟工作，但就是不願把資金投放在創新和新興產業——尤

其是那些令低層社會成員受惠的新業務之上」——相信世上再沒有一套經濟理論，能較「富人的尷尬」解釋香港目前的發展困境，來得更加貼切。

總括而言，Jacobs 的關注焦點其實在於：一個城市的發展必然經歷有升有跌、高低起伏的發展周期挑戰，有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城市若能有效取得真確的訊息反饋，市場及產業結構能夠不斷創新和調整，則自然會構成一個持續的良性循環，令城市繁榮安定能夠延展下去；相反當城市不斷取得錯誤的訊息反饋，又或被特殊利益團體所刻意愚弄和誤導，則會出現如她所說的「每況逾下的交易」(transaction of decline)，形成不做不錯、愈做愈錯的惡性循環——"This city is dying, you know?"也就不再是一個遙遠和未知的噩夢。

3. Arrow、Romer 與內生增長論

我在2017年初的文章中，曾提及芝加哥學派 Robert Lucas 和 Paul Romer 關於人力資本的理論。不到幾個月之後，廿世紀美國經濟學巨匠、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Kenneth Arrow 與世長辭，終年95歲。容我趁這特殊的時刻，在這議題上再略補一筆。

知識傳播的「溢出」？

為什麼將 Arrow、Lucas 和 Romer 相提並論呢？ Arrow 乃以「社會選擇理論」(Social Choice Theory) 聞名於世，力證民主選舉的「不可能定理」(Impossibility Theorem)；但他在1962年，曾寫過一篇名為"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

Learning by Doing”的文章，試圖推翻重視技術革新的「外因增長理論」(Exogenous Growth Theory)，強調由於技術工人「邊做邊學」，通過不斷互相學習和模仿，形成知識傳播的「溢出」(spillover) 或「正面界外效應」(positive externalities)。由此帶動「內生增長」的良性循環，乃是促進經濟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。

相對於 Arrow 的其他顯赫理論，這篇文章當時曾牽起一陣討論，但很快便不了了之。直到1980年代末，Romer 及其芝加哥大學老師 Lucas 相繼發表論文，終於通過異常繁複的計量模型，將「內生增長理論」打造成經濟學界的顯學。尤其是在 Romer 的模型中，由於知識生產和技術創新的優勢，帶來「壟斷性競爭」(monopolistic competition) 彷彿是理所當然的。知識優勢不再因阻礙競爭而被視為「市場失靈」的案例，因為這正是市場遊戲規則的必然組成部分，又或促進整體經濟發展的必然代價。

Romer 模型的其中一個亮點，是引入知識非公亦非私、而是作為「會所產品」(club good) 的特質。他指出創新的知識和技術，具備一定的排他性 (partially excludable)，能讓研究或發明者形成局部壟斷，起碼在初段能確立市場的優勢；但與此同時，知識產品並不構成任何互斥性 (non-rivalry)，用家並不減少他人使用的利益。特別是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發達，知識和技術一旦被公開傳播，複製和分享的邊際成本幾乎等於零，因此亦帶來學習和模仿的無限可能。

至於 Lucas 的理論模型，已於前文述及，在此不贅。

經濟無止境增長？

主流經濟學家長期視「界外效應」為洪水猛獸，因為它令私有產權難以確立，個人無法獲取與付出相應的回報，由此推斷市場「無形的手」難有效運作。但 Romer 和 Lucas 卻反其道而行，大力吹捧知識傳播的「溢出」，能歷久不衰地推動經濟的長期持續發展。回望他們身處的1990年代初，恰巧是格林斯潘出任聯儲局局長的美國盛世，是對科技和人力資本投資的盲目崇拜，以及知識型經濟的迷信被無限放大的年代。不出數年，互聯網泡沫極速破爆，經濟無止境增長的神話，自然宣告破滅。

恰巧最近我也在讀晚期福柯（Michel Foucault）對新古典經濟學、特別是芝加哥學派的論說（對象主要是學派較早期的代表 Gary Becker，1930-2014）。福柯指出它已徹底背叛了古典經濟學，例如是對市場自由競爭的堅持、對國家干預的排拒等信念。對新古典經濟學來說，致力促進任何有利商品化的發展，追求經濟的盲目增長已成為唯一目標（彷彿就如鄧小平的金句：發展是硬道理；不管黑貓白貓，捉到老鼠的就是好貓！）。至於所謂人力資本的理論，一言以蔽之，無非就是合理化高度壟斷性的產業，強化勞動力剝削的新包裝而已。

事實上，2016年在 Romer 被委任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顧問後，出人意表地發表了一篇發人心醒的文章，指出過去30年的宏觀經濟學，由於過份依賴複雜的數學模型，卻往往對現實經濟處境視而不見，其「堅離地」的象牙塔傾向已亮起紅燈。文中更用上「後真相宏觀經濟學家」（post-real macroeconomists）的字眼，點名評批恩師 Lucas 正是始作俑者之一，就更令人讀得瞠目結舌。Lucas 並無就此公開反擊，但其他被點名者則指出，30年前，Romer 本人正曾是「後真相」的最大受益者。

香港創新科技泡沫

無論內生增長理論有多少含金量，均早已成為離地政客堅信不疑的金科玉律，同時又創造了多少創新及科技產業政策的鬧劇。就以我們的特區政府為例，早年大力推動大專學額急劇擴充，便被評為教育的「八萬五」政策泡沫；至於各項創新及科技產業政策，則往往魚目混珠，製成各種利益輸送的借口，甚至最終淪為一個個地產項目。

前文提及香港喜歡宣揚自由競爭的理念，但骨子裡卻信奉 Romer，對單一行業壟斷的局面照單全收。問題的關鍵，更在於官辦創新及科技產業，到底又能帶來多少知識傳播的「溢出效應」？正如龍子維指出，撥地大搞河套科技園與物流中心的「輸入企業」模式，其實正日漸扼殺中小企的生存空間。某程度上，這和在香港引入迪士尼的舉動如出一轍，是扼殺創意的表現——其沒有創意就像大企業因無法創新，便需透過併購收購創新企業，以維持賬面上的風光一樣[註一]。

自楊偉雄出任創新及科技局局長後，旋即決定在將軍澳工業邨興建兩座高效能大樓，以配合先進製造業的發展，建造成本為82億元。楊偉雄指有關工程「超值」，不擔心工程會「爛尾」，他的說法實在可圈可點：「無論哪一個政府，都有些超越自己任期的工作，香港一定不可以只看短線，要看長線。」楊偉雄這句話本身確是無可厚非的，但觀乎過去所有的「政績工程」，香港市民確實也無謂太過擔心——新計劃變成「大白象」的機會，肯定不會低於90%[註二]。

註一：　龍子維：〈持續輸入企業就可推動創新？〉。《信報》，2017年1月17日。

註二：　鄒崇銘：〈高效能大樓的門面牆〉。《信報》，2016年3月7日。另見本書第九章。

4. 黃色經濟圈促進產業轉型

近年人們關於「黃色經濟圈」的討論，主要涉及政治與經濟領域的關係，卻較少從對經濟的貢獻或損害本身，來衡量它的價值和意義。站在建制派的觀點，黃色經濟圈帶有鋤強扶弱、劫富濟貧的意味，難免會令建制或既得利益受損；但從香港整體及長遠利益的角度，黃色經濟圈卻有助打破壟斷、促進競爭，推動產業新陳代謝。它能為一直「食老本，搵快錢」的香港經濟，注入清新和健康的改革活力，並令年青一代重拾對未來的希望。

「產業短缺」是問題根源

正如我在《以銀為本》（2014）一書中指出，「產業短缺」是香港經濟的真正問題根源。在「地產霸權」的龐大既得利益體制之下，香港經濟全面向基建地產傾斜。由地產商主宰下的城市空間，呈現產業單一化和集團壟斷化的趨勢。香港常號稱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城市，但市民無論在就業和消費選擇上，均早已變得愈來愈欠缺選擇。

追本溯源，回歸前香港被「九七大限」的魔咒困擾，加上內地不斷加快開放步伐，香港工業進一步大舉北移，形成香港產業面臨空洞化的危機，經濟結構早已出現嚴重失衡。首任特首董建華其實深明問題的迫切性，故一俟回歸後已立即改弦易轍，寄望通過「大有為」政府的積極介入，能扭轉香港的歷史軌跡和宿命。但尤其是董個人能力的極為有限之下，終變成了「畫虎不成反類犬」。

正如已故浸會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曾澍基（1950-2014），在歷年來僅見的相關學術研究中指出，回歸後特區政府的經濟發展策略，最終出現了兩個南轅北轍的

模式：其一是自1997年作為起步點，由董建華和梁錦松主導的「本土優勢觀」（local advantage view），致力50萬人上街而告終。

其二則是2003年之後冒現，先有中央政府推出的「救港措施」，繼而由曾蔭權在2005年後接手的「資源流動觀」（resource flow view）。假如「本土優勢觀」著眼於香港作為一個完整的經濟實體，須建立有別於內地城市的競爭優勢；則「資源流動觀」視中港融合為無可避免的必然趨勢，政府的工作是致力消除一切妨礙融合的障礙[註一]。

「本土優勢」已不復存在

隨著「本土優勢觀」在董治時代徹底破產，「資源流動觀」尤其是在中央政府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，十多年來已取得壓倒性的優勢。曾蔭權和一眾政務官班底沿襲了前朝的無為而治作風，起碼從表面上來說，政府只扮演有限的市場角色，其餘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調節。因此儘管長期深受各類危機的衝擊，但在相當程度上，香港經濟結構失衡的格局，其實和回歸之前完全沒有兩樣。

曾澍基認為，香港必須在內地進一步開放的過程中，盡快找到本身的獨特經濟定位，如此才不會在與內地城市的競爭中被邊緣化。在中國經濟尚未全面開放之際，香港擁有的主要是地理位置上的優勢（location advantage）；但當中國經濟愈益全面對外開放，則這種門戶角色早晚也會消失，香港必須重新建立質素上的優勢（quality advantage）。問題卻在於，假如香港政府只一味放軟手腳，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質素優勢，反而任由市場衍生「劣幣逐良幣」的情況，則香港便連僅有的一根救命草亦不復存。

過去十多年的中港融合趨勢，已構成本土就業和發展機會的微妙轉變。自2006年香港經濟復甦以來，香港失業率長期維持在3% 上下，印證了在資源流動觀之下，融合對提供就業職位的積極作用；但期間堅尼系數則不斷上升，香港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。這不但反映中層就業崗位和向上流動機會的受阻，亦反映低收入人士的所得增長遠較高收入人士緩慢，其生計即使通過最低工資亦無法保障，甚至要出動低收入津貼來加以維繫。

概括而言，隨著中港融合帶來的龐大商機，為香港經濟增量提供了巨大動力；但這些唾手可得的搵快錢機會，代價卻是令香港工商百業的質素停滯不前。只要看看每天無數自由行旅客源源湧入，香港的藥房只要儲備足夠的奶粉、藥物和化粧品，財富自會源源不絕滾滾而來，還那會有空去開拓什麼新的業務？旅遊飲食零售服務業早已供不應求，又那裡會有心思提高服務質素？試問香港那裡會有一家食肆，侍應可以不用跑著落單和上菜的？

而這一切，亦正是香港青年愈來愈感到絕望，無法在未來找到自己位置的最根本原因。

自下而上的本土產業動力

必須強調的是，無論是本土優勢觀或資源流動觀，在曾澍基筆下皆屬於集權式的產業政策，由特區政府甚或是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規劃。即使表面上政府強調不干預市場，實際上卻投放大量公帑資源（例如在大型基建上），並且向狹隘的產業和集團傾斜。特別是在民主政制停滯不前下，香港市民根本無椽置喙，只有「被規劃」的份兒，但卻需要承受產業政策帶來的後果。

相反黃色經濟圈的顛覆性論述，則構成了一種未來的嶄新想像，令市民有可能藉自下而上動員，重奪本土產業發展的主導權。香港市民作為消費者，乃是產業生存的最重要基礎，只是由於過度分散，過往難以構成左右產業發展的集體力量。但在網絡平台無遠弗屆的當代經濟下，交易成本大為下降，集合消費者力量變得容易實現，這亦構成了黃色經濟圈的主要制度條件[註二]。展望未來：

黃色經濟圈將有助突破少數集團壟斷，促進產業的彈性、靈活和多元化發展。這對既得利益者來說固然是洪水猛獸，但對普羅市民和消費者而言，則只是重拾選擇權利和生活自主，回到「最自由經濟體系」的初衷。撥亂反正，如此而已。

黃色經濟圈的想像令產業不再一味「以銀為本」，而能注入更多「以人為本」的元素。我們的城市和經濟毋須一味「向錢看」，追逐股票市場或經濟指標數字上的進賬；反而更能把焦點重新放在產品的質素、服務的細節，令產業真正對應消費者的生活所需，體現人的溫度。

這種想像亦令產業發展的重點，由好高騖遠回歸到本土根基。我們不用再老是大談13億人口的大中華市場，甚或是數十億人口的一帶一路市場；而是令產業尋回本土的獨特優勢，在全球化的融合過程中重建清晰定位。不再人云亦云，隨波逐流。

註一： Tsang Shu Ki (2007) "The Hong Kong Economy under Asymmetric Integration: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r Dissolution?" China Review, 7,2: 35-63.

註二： 〈從網絡動員到生活自主〉，本書第九章。

5. 從武漢疫情反思中港融合

縱使特區政府千萬個不願意封關，但在現實上，中港經貿聯繫仍必然大受武漢新型肺炎疫情打擊。除了基本生存所需的物資以外，大部分經濟濟活動已即近停頓。推動中港融合被奉為發展的金科玉律，正是典型的主觀政治意志和客觀市場規律的矛盾，最終政治往往凌駕市場需要，亦是回歸後香港宿命的縮影。

2003年沙士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，300名市民的性命白白斷送，當年景象至今仍記憶猶新。隨著當年7月百萬人大遊行，董建華的七年管治走到了盡頭，同時亦象徵著香港歷史的轉捩點。香港面對經濟泡沫爆破和沙士的雙重打擊後，百廢待興。中央政府提供的各項救港措施，遂成為了香港僅存的一根救命稻草。但在十多年後回看，推動中港融合的代價，則是令香港徹底失去經濟自主性。

設想在新型肺炎過後，現時的中央政府還會打救香港嗎？但即使會，經歷了多年中港融合的香港人，未知又會作何感想？

從沙士到大灣區規劃

上文我已引述已故曾澍基教授的研究，指回歸之初的董治時期，曾一度力圖推動香港經濟轉型和重建本土優勢。但隨著2003年「本土優勢觀」徹底破產，「資源流動觀」尤其是在中央大力扶持以至積極推動下，馬上取得壓倒性的優勢。曾蔭權在2009年提出六大產業——醫療、教育、環保、測檢認證、創新科技和創意文化，儘管看似是前朝知識型經濟發展策略的延續，卻其實悉數依托於2008年出台的《珠江三角洲改革發展規劃綱要》。到了梁振英上台之後，遂正式構成了現時人們熟悉的《粵港澳大灣區規劃》。

早在1990年代初開始，曾澍基已曾針對香港工業北移和產業空洞化，開展了「曼克頓化」(Manhattanisation) 和「二元經濟」(dual economy) 的一系列探討。當時香港失去製造業作為經濟支柱，愈益向金融地產的第一元傾斜，餘下提供大量職位的基層服務業，則構成了低技術、低增值的第二元經濟。曾澍基在關注香港競爭力下降之餘，更關心產業結構的適當均衡、市民人盡其才的機會及生活質素的整體提升。香港所需的亦絕非單純經濟數據上的增長，否則就根本不用花時間談第二元經濟。

資源流動觀既一反董建華的「大有為」哲學，全面趨向曾蔭權無為而治的作風，恰巧亦與主流經濟學背後的「新自由主義」理念，對「小政府，大市場」的迷信吻合。起碼從表面上來說，政府只扮演營造有利市場環境的角色，將具體經濟運作、資源流動和分配方式，盡皆留待市場機制自行調節。在曾蔭權治下的七年，尤其是內地資源大舉流入的刺激下，新的股樓泡沫遂無可避免地又再迅速形成。

正如曾澍基長期以來一直警告，中港融合乃是一張凶險的雙面刃，它雖然能化解即時的經濟危機，帶來立竿見影的神奇功效，但卻是極短視和急功近利的做法，長遠勢必令香港失去獨特的競爭優勢。尤其是在毒奶粉和一眾食物安全的危機上，香港和內地的相對優勢便大大突顯，香港的法律和制度上的信譽，正是中外企業繼續需要依靠香港的主要根據。問題卻在於，假如特區政府不主動鞏固這得來不易的本土質素優勢，市場遂難免衍生「劣幣逐良幣」的情況。

政治凌駕市場需要

資源流動觀表面上順應市場規律，骨子裡卻是一大政治工程。最具體例證莫過於於曾蔭權2007年提出的《十大建設計劃》，其中竟有多達六項——廣深港高鐵、港珠澳大橋、屯門機場連接路、港深機場合作、共同開發河套區和新界東北新發展區，均與中港融合的大型基建有關。十多年來，不但構成了凱恩斯式的積極經濟策略，為早已過熱的樓市火上加油，同時亦形成尾大不掉的公共財政包袱，在一輪過度投資後無以為繼。

毫無疑問，中港融合在兩地政府的大力補貼下，短期形成了表面上的無限商機，彷彿人流、錢流和貨流再無限制地流動，則一切經濟問題便會迎刃而解。但究其實，這只是個短線的政治投機浪潮，消費我們的經濟、社會和環境資源，盡情「碌爆」子孫後代的信用卡，即時營造出烽烽火火的浮華盛世，如此而已。香港享受了十多年中港融合的短期紅利，現時亦正是「出得嚟行，預咗要還」的時候。

此還未計算香港對內地經濟過度依賴，構成市場欠缺靈活調節的系統性風險。情況就好像侏儸紀時代的恐龍基因，難以適應環境突如其來的轉變，偶發危機的破壞威力便會以倍數放大。毋庸多言，由於資源無阻隔的自由流動，構成了病毒迅速傳播的途徑，較之沙士時期不知高效多少倍，就更是眾所皆知的事實，在此毋須再一一細表。

中期經濟前景頗堪憂慮

無論如何，大錯既已鑄成，現時再追悔也沒有什麼用。更大的挑戰卻擺在未來數年，即使新型肺炎得以控制，但整體經濟前景仍頗堪憂慮。首先是經歷了政治風暴和肺炎衝擊，特區政府的管治能力已路人皆知，表露無遺，以至評級機構紛紛調低香港評級，全球投資者對香港的制度優勢信心盡失。要一時三刻化解管治危機對經濟的困擾，實在是談何容易。

其次則是如上所述，香港依賴大型基建投資的積極經濟策略，早已成為強弩之末。在沒有必要大灑金錢之際，已經「先使未來錢」；到了真正需要應急之時，才發現口袋裡已所餘無幾。未來即使堅持毫無經濟效益可言的「明日大嶼」和「北部都會區」，唯一作用亦只是吸收過剩的產能，卻無助香港重拾長遠競爭力。在原有基建全面嚴重虧蝕、財政壓力與日俱增之下，要讓任何新計劃強行上馬，結果亦只會事倍功半。

最後，過去數年的中美貿易戰，已對中國經濟構成嚴峻挑戰。短期內全球各國或會聯手抗疫，暫且將眾多政治經濟矛盾放下；但一旦疫情得到控制之後，便難保西方列強不會落井下石，進一步將中國推向經濟深淵之中。尤其是在俄烏戰爭之後，世界局勢長期趨於不穩定，大國博弈難免代來沉重代價。而香港既然已踏上中港融合的不歸路，苦果自然亦要一併自作自受。

6. 「震撼」作為挽救經濟良方

2007年，金融海嘯前夕，Naomi Klein 出版了《震撼主義：災難經濟的興起》（The Shock Doctrine: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）一書，可說是準確地切中時弊[註一]。但十多年來，全球資本主義並無根本改進，反而變得更加走火入魔。到了2020年的新型肺炎疫情，令「震撼主義」的驚世預言，再次明白無誤展示出來。

英國：福島戰爭的成就

「震撼療法」（Shock Therapy，或稱「 震盪療法」）的概念，來自1950年代的精神醫學，試圖通過電擊為病人進行激進治療。1970年代被經濟學大師 Milton Friedman 挪用，來形容急進市場改革的經濟處方。最初「震撼療法」主要適用於專制落後國家，通過高壓手段摧毀舊制度和動員激進改革力量，主動對市場進行「創造性破壞」，但它最終亦被英美民主體制所普遍採用。

最激進的市場震撼療法，莫過於對大型戰爭、恐襲和天災加以利用；而近代最具標誌性的例子，則莫過於1982年發生的福克蘭戰爭。阿根廷政府在沉重經濟困境下，藉機入侵英屬福克蘭群島；同樣面對水深火熱政經危機的英揆戴卓爾夫人，則出人意表地堅持出兵千里之外，不惜一切奪回那荒蕪一片的小島。結果雖然傷亡慘重，但英國還是收復了失地，事件並成就了戴卓爾夫人的統治盛世。

兩次波斯灣戰爭，則可說是布殊父子的東施效顰做法。尤其是2003年的入侵伊拉克，作為戰爭背景的九・一一事件，原來只是一次偶發性的災難危機，最終

小布殊卻成功利用了美國人的仇恨情緒，近乎無中生有地發動戰爭，並有效延續了其管治威權，令苦無出路的美國經濟苟延殘喘。直至奧巴馬上台後金融海嘯發生，已是後話。至於2008年的四川地震和2012年的日本海嘯，同樣弔詭地構成了中日兩國重振經濟的重要契機。

美國：右翼民粹的舞台

從近期的事態發展可見，震撼主義已全面回歸。尤其是在特朗普右翼民粹的政治操作下，震撼療法的功效更將會被無限放大。由於中美貿易戰持續，加上油價大幅波動，美國經濟原已成為強弩之末，為共和黨的選情添上變數。而肺炎疫情令經濟前景雪上加霜，更對特朗普連任甚為不利——但同時卻為他帶來又一次難得的豪賭機遇。

儘管對抗疫情的工作極受質疑，但特朗普已致力把焦點轉向盡快重啟經濟。隨著國會通過歷來最大規模的救市方案，巨額資源將掌握在其舞弄之下，足以擺平眾多利益集團的期望。原已欠缺競爭力的產業如航空業，現在反而得到巨額公帑的打救；相反一些與疫情相關的問題，例如基層醫療和健康保障，卻根本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。

數以萬計的美國人性命雖然斷送了，但死亡率不但長期被低估，特朗普亦一直極力淡化疫情的影響。美國人在惶恐不安的繃緊心理狀態下，對「強人政治」的依賴卻是有增無減。只要疫情不會再拖延太久，經濟從谷底反彈的機會仍大，加上民主黨的對手根本挑戰乏力，特朗普選情便大有機會轉危為安——當然種種樂觀預期能否兑現，難免仍存在極大的不確定性。

香港：政治掛帥，經濟依附

相比之下，儘管中國是肺炎疫情的源頭，但在集權體制的強力手段下，防控工作似乎確要較西方國家有效。與2008年相比，現時中國對外貿的依賴已相對減少，儘管國際政經環境仍然充滿挑戰，但總體危機感並沒有過去那麼明顯。總的來說，習近平看來要善後疫後局面，在二十大前鞏固他的領導核心地位，暫時並無需要作出過大的動作。

反而是和2003年相比，沙士成為中央全面介入香港管治的契機，17年下來，香港的高度自治地位已蕩然無存。一方面，中央已經再沒有重大的誘因，需要像2003年般大力打救香港經濟；另一方面，儘管港澳工作系統已全面撤換，但從近日的事態發展看來，仍然維持著「堅離地」的鬥爭思維，「無底線」地直接介入香港自治，政治掛帥仍凌駕於社會經濟的需要。

在面對反送中運動和疫情的接連考驗，林鄭月娥班子早已左支右絀、疲態畢露。儘管一時三刻沒有被撤換的機會，但套用港英時代的流行術語，命定亦只能是個「跛腳鴨」般的看守政府。除了即時和短期的回應性措施以外，根本就缺乏足夠管治權威和能力，借助危機進行大型的社會經濟改革。加上在中央指揮棒的揮舞下，香港經濟只會愈益依附大灣區，失去尋求自主出路的可能性。

或許仍是那句老掉大牙的話：在香港由文官壟斷的管治體制下，不做不錯已是永恆的定律，也不要指望政經困局能有所突破。一旦有人如林鄭要有大作為之際，那便是危機真正將要來臨的時刻。

註一：　同一系列的紀錄片可見諸：https://youtu.be/aL3XGZ5rreE

7. 無法減速的瘋狂列車

新冠肺炎疫情延續，導致大量商貿活動陷於停頓，全球經濟遭到空前重創，較諸金融海嘯猶有過之。與此同時，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之下，各地經濟貿易被高度綑綁，一地危機很容易便擴散各地，進一步加深了系統性崩潰的風險。

為什麼在這個看似先進和富裕的廿一世紀，人類社會還是顯得如此脆弱和不堪一擊？是因為病毒無遠弗屆的傳播威力，抑或社會經濟制度存在的根本缺陷？假如肺炎疫情能帶來什麼教訓，則我們最需要學習和改變的又是什麼？

停一停，想一想

在新冠肺炎出現之前，香港人每天都在營營役役地上班和上學。打工仔花了大量時間在辦公室，為了生計和生活而打拼。學生們則花大量時間在背誦課本，為了「贏在起跑線」而努力奮鬥。競爭和進步的思維深深植根於文化基因。彷彿人們一旦放慢腳步，放眼看看遠方的景致，整個世界就會崩塌下來似的。

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現之後，大部分社會經濟活動停擺了。儘管仍需在家工作或進行網上學習，但在省卻交通往返的時間之後，陪伴家人的餘暇還是多了許多。然而問題卻來了，香港的居住空間已經夠侷促，和家人長時間悶在斗室之中，竟變成和困獸鬥沒有什麼分別！更關鍵是除了專注於工作和讀書，我們從來都

不懂得善用空閑時間。一旦當極大量的空閑時間出現，大家反而會變得徬徨無助！

由於經濟前景極不明朗，打工仔難免要為未來而焦慮。低下階層更有可能「手停口停」，在疫情下仍要四出為生計籌謀。不錯，其實大家也不一定很得閒，其實還是要面對各種競爭壓力，其實，還是有數之不盡的還是……然而，那怕是只有一刻能稍稍緩慢下來，大家又可以怎樣過呢？還不是盡情忙碌在手機屏幕之上！？

工作——生活平衡？

於是，人們喜歡轉而大談退休生活，最好是50歲就能退休，然後真正地好好享受人生。不過先決條件嘛，還是要先儲備充足的彈藥，達成「財務自由」的目標。因此便必須先拼命上班、拼命賺錢、拼命儲彈藥……到頭來，退休生活只是一個遙不可及的空想、一個鞭策自己繼續拼搏奮鬥的工具，如此而已。

近年企業和僱主都愛談「工作—生活平衡」，還會在公司的會議室舉行瑜珈班、烹飪班、親子班和生日會……諸如此類。不過這世上也沒有太多這類免費午餐，到頭來，打工仔不又是要繼續加班、把工作帶回家做，兩個、三個、四個人的工作由一個人來做……打工仔只能不斷在工作崗位上競爭和攀爬，並沒有別的選擇。

然而，以上邏輯正愈來愈不適用於新生代。因為打從他們懂事以來，便不知「全職工作」為何物，如此又怎會明白加班 OT 的意義呢？自他們踏進職場之後，迎面而來就是無盡的散工、臨時工、兼職工……以往僱主通過外判來減省成本，

現在他們就連聘請全職員工也有困難。因為新生代早已習慣了 slash、習慣了自由職業，無拘無束的生活方式——當全職也未免太辛苦了吧！

奴性化的制度

上述無法處理閑暇的狀態，固然有其心理或文化背景，例如香港人信奉的「獅子山下精神」之類，但我更感興趣的是制度和政策的因素。毫無疑問，此乃是一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問題。香港除了有低廉的普及教育和醫療，不少人還享有低廉的租住公屋，但就是沒有完善的失業和退休保障。這大概就是整體社會努力不懈的激勵機制，好處是造就了空前的浮華榮景——但壞處卻是集體迷失了自我。

不問可知，近年就連一些基本生活需要，也已經變得愈來愈商品化。在公屋輪候時間不斷加長的同時，政府還將土地資源大量放在綠置居、居屋和租置計劃等，公屋流轉政策則不斷催迫租戶遷出；公立醫院的輪候時間愈來愈長，亦迫令市民必須通過購買醫療保險來自保；傳統津貼學校大概仍能提供優質的「填鴨式教育」，但想有另類選擇嗎？便自能自費尋找直資或私立學校。

以往人們談資本主義社會的剝削，更多把焦點放在生產的領域，即著眼於老闆如何搾取打工仔的勞動成果；但在香港《基本法》規定下的資本主義制度，則更「先進」地放眼於個人和集體消費（或稱「再生產」）的領域。資本主義鼓勵人們盡情工作，然後盡情消費；但香港資本主義既鼓勵人們盡情工作，但到頭來卻是被迫消費。

不是這樣嗎？請看看新發展區的大型商場，連綿不絕的大集團連鎖店；又或是舊區的領展商場和街市，十室九空的慘淡景象。在土地資源的高度壟斷和商品

化下，香港人的消費選擇愈來愈局限，但百物價格就不斷向上颼升。就算不用承受高昂的樓價和租金，打公仔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，最終還不是全都向地產商進貢？

近日不少人在大談拿 BNO 搬去英國，就連倫敦的樓價也給香港人熱炒起來。但更多的朋友卻在告訴我，只要在倫敦乘搭一小時火車，就在不那麼偏遠的中小城鎮，十多廿萬英鎊已能置業，再貴一點已是千多二千呎的豪宅！他們毫不誇張地說，若能變賣香港現在的窩居，在英國足夠買兩、三個豪宅單位！

日本化的經濟

放眼全球，在肺炎疫情之下，市場停擺同樣帶來了空前的經濟危機，意味其他國家地區的人民，也不比香港人能有更多的餘裕。儘管基本物質供應（例如食物、能源和藥品）暫能維持，但由資本主導的世界卻已無以為繼。正是由於過去半個世紀，不少發達國家的和香港一樣，經濟結構愈趨金融化和離岸化，本土經濟則愈趨泡沫化和空洞化，以至眼前浮華彷如肥皂泡似的，竟一夕間便盡被無情的戳破。

不是說各國央行還可不斷印銀紙嗎？從2008年金融海嘯到現在新一輪的量化寬鬆，美國聯儲局確在短期內穩住金融和資產市場，避免近百年前大蕭條時期的全面崩潰。但將大量流動資金注入市場，卻很可能只是令經濟泡沫延續甚至擴大，未必能惠及早已七勞八傷的實體經濟。由此整體經濟彷彿斷開了兩層——上層繼續在資本的指揮棒下炫耀魔法，下層人民的日常生計則仍然難以持續。

正如《經濟學人》雜誌警告，發達國家正面臨巨大的「流動性陷阱」(liquidity trap) 風險。極度寬鬆的貨幣政策，再無法對實體經濟產生任何刺激作用。情況就彷如1990起的日本經濟，長期處於低迷的局面，政府大灑金錢同樣毫無作用。產業萎縮、失業率高企、貧富差距擴大、中產階級消失、「M 型社會」相繼出現……種種後遺症至今仍揮之不去。

但撇除經濟上的種種困境，日本就真的沒有帶來正面的啟示嗎？年青人失去向上流動的機會，轉而發掘其他發揮潛能的方式；大城市的浮華生活不再，便在中小城鎮尋找另一種生活模式；過度消費的物質浮華走到盡頭，卻有可能在「斷捨離」之後重新發現自我。在此我並非想刻意浪漫化日本的蕭瑟，只是想說再擔憂也沒有用，而人則應該有更多不同的選擇——日本人放慢了的生活節奏，不正是香港人理想中的人生嗎？

如果，命運能選擇……

8. 產業失衡下的市場錯置

新型肺炎疫情持續，工商百業無不大受打擊。除了貨運物流仍然維持，跨境經貿活動已幾乎完全停頓。幸而在資訊科技發達的今天，在家工作的難度實較想像中為低，大量企業管理和聯繫的工作皆可通過網絡進行，即使數十人皆可同步參與網上會議。如此香港經濟才不至陷於癱瘓，市民生計還有一點點的保障。

肺炎疫情揭示在全球一體化之下，不同地域和部門盤根錯節、環環相扣，那怕可能只是在細微環節出錯，均有可能構成災難級的系統性風險。「一隻蝴蝶在

中國拍一下翼，便會在美國引起一場龍捲風」，所謂的「蝴蝶效應」已不再是個比喻，而是真實具體地呈現在大家面前。這次疫情對全球公共衛生、以至更廣泛層面管治架構，難免將產生深遠影響。

本地生產的可能

早前由於口罩供應短缺，公私營機構皆向全球搶購口罩；而民間自救的主要方式，則是通過外地親朋戚友，化整為零地把口罩速遞到戶，甚或直接在外地網站訂購，但郵政系統亦因而近於癱瘓。看來種種網絡營銷及交易，未來將必進一步大行其道，打破經濟活動的地域疆界，令地方法律和管制失去效用。對本地政府及外貿企業而言，這仍是一個全新和未知的挑戰。

與此同時，不少有心人則力圖在香港設立口罩工廠，或引入機械化的口罩生產線、或組織幾個車衣工人，小量縫製布口罩。但似乎所有人皆異口同聲地說，這盤生意根本沒有盈利的可能，只算是盡一點社會責任而已。尤其是當疫情過後，這類「戰時產業」便會面對產能過剩的問題，以香港的租金和工資水平，要和廉價進口貨競爭又談何容易？

然而，土產口罩畢竟是個極有意義的嘗試。就算低增值本地產品未必有出路，但高產值產品卻未必沒有生存空間。正如我在《後就業社會》（2018）一書指出，在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的衝擊下，眾多行業的大規模生產早已顯得過時。知識和技術的網上迅速傳播，令工藝得以更有效承傳和普及。各類開放源碼的軟件和硬件，和化整為零的分眾市場，為小規模的在地生產帶來無限想像。

閒置農地的想像

歸根結柢，香港土地及工資成本高企，加上產業結構愈趨單一化，已令原有多元開放的市場活力窒息。自2003年沙士之後直到今天，彷彿有舖位就必定做自由行旅客生意，有土地就必定靠地產發達，其餘「欠缺經濟效益」的產業一概被排斥。我們愈來愈專注於最賺錢的行業和產品，其他的社會經濟需要一於少理——因為彷彿只要有錢，餘下所需的都可以用錢買到。

尤其甚者，是主導產業早已習慣點石成金的魔法，並預期未來這種強勢仍能不斷延續。因此即使出現市場錯置，一時三刻仍然難以有所調整，資源浪費的情況更是習以為常。就算核心商業地段到處都是吉舖，卻遲遲未見減租求讓的可能；大型地產商囤積以千公頃計的農地，往往閒置幾十年亦未有新的用途。由此遂構成「有人冇地用，有地冇人用」的畸形現象。

肺炎疫情正好提供了及時警告，反映暴利行業並非千秋萬世，物質豐盛亦不是理所當然，我們正好是時候居安思危，為城市的抗逆能力作出檢討。以長期閒置的新界廣濶農地為例，便一直只被視作等待發展的土地儲備，早晚都會被改作公營或私營房屋之用；相反由於盈利價值過於偏低，原有農業法定用途完全被漠視，農地寧可長時間閒置也不會加以善用。

但隨著全球氣候和生態危機加劇，加上跨境經貿活動的各種系統性風險，農產品供應的波動只會與日俱增。就以年前的非洲豬瘟為例，已足以令內地鮮肉市場翻起巨浪，甚至促使不少地區人民重新食用野味，說這是新型肺炎的遠因之一亦不為過。假如香港能充分善用本土的農地，不但可以為我們提無多一重糧

食保障，同時亦可減輕對地球資源構成的壓力。這些看似遙不可及的事情，其實已經愈來愈迫在眉睫。

棕地改劃的考量

執筆之際，規劃署宣布初步物色了八組位於元朗、屯門及大埔的棕地群，涉及36幅合共63公頃用地，預計在引用《收回土地條例》收地，並併合成較完整地皮之後，將可提供逾二萬公營房屋單位用地。這在土地政策發展的角度來說，無疑是一個不小的突破；但對原有的物流和後勤作業、以至整體新界土地利用會有什麼影響，實在必須加以仔細衡量和妥善安排。

毫無疑問，對普羅香港市民而言，公私營房屋供應是重中之重的議題。但在急於追趕建屋指標之際，卻沒有必要不問情由的「盲搶地」——特別是星羅棋布的新界細碎地段。住宅用地的分布過度分散，不但欠缺發展的規模效益，對交通基建和社區設施構成沉重壓力，同時亦對鄉郊社區環境造成嚴重破壞。作為有遠見的政府和地產商，實應在住屋、社區、生態和農業各方面，作出更合理的平衡和更整存的規劃，為香港長遠可持續性盡最大努力。

9. 產業規劃的向北望與內循環

在2020年的武漢新型肺炎疫情之初，特區政府曾提出現金發放計劃，向合資格市民一次性發放10,000港元。到了2021年，改為推行5,000元的電子消費券計劃，改讓市民通過八達通等四種電子支付工具申領，並且必須在約半年內使用，否則消費券便會作廢。

這難免令人聯想到，近期內地關於以數碼貨幣取代人民幣的傳聞。眾所周知，電子支付工具在內地的普及率極高，以至若沒有安裝支付寶或微信支付，在當地的衣食住行皆存在極大困難。然而假如數碼貨幣全面實施的話，則意味一切資產和貨幣交易，皆通過中央數據庫加以紀錄，這世界便再無任何私隱可言。

從「雙規貨幣」說起

未來內地的數碼貨幣尚未可知，但特區政府發放的電子消費券，則大可以稱為一種典型的「雙規貨幣」——也就是必須在「規定時間、規定地點」使用的貨幣！具體而言，這種貨幣存在特定的發行目的和用途，通常不能兌換成其他貨幣，因此亦可充當更具針對性的政策工具。

事實上，早於約100年前，早已被人遺忘的德國經濟學家 Silvio Gesell，正是這種「雙規貨幣」的最有力主催者。在他看來，貨幣的主要作用是促進市交易，而不是漫無目的、永無止境地積累起來[註一]。Gesell 曾經歷過貨幣的大規模貶值的痛楚，相信積累貨幣乃是造成經濟動盪的重要因素。

為了解決貨幣危機帶來的經濟災難，Gesell 開始倡議有使用期限、逾期作廢的貨幣。顯而易見，用意是令貨幣政策配合政府的目標，更能起到立杆見影的經濟效益，而私人財富則難以不成比例的滾存，資金外流或資產流失的可能性亦會降低。時至今日，Gesell 的觀點早已在主流經濟學中「被消失」；但由於電子消費券的經驗，相信香港人很容易理解它的意義。

除了消費券外，香港亦存在不少民間「社區貨幣」計劃，其中以源於灣仔區的「時分券」最廣為人熟悉，原意正是讓欠缺現金的基層市民，能各盡其才、互

通有無。由於使用者的數目、覆蓋的產品服務範圍較少，因此能發揮的社會經濟功能亦有限；但隨著愈來愈多機構加入計劃，跨區兑換和流通變得可能，近年社區貨幣亦有了長足的發展。

促進內循環，非閉關鎖國

和雙規貨幣不無關聯的，是大陸近年關於「內循環」的討論。在中美貿易戰的新常態下，中央政府力圖通過擴大內部需求和投資，避免經濟過度依賴出口和國際「外循環」，從而紓緩系統性經濟危機的風險。設想若真的推行雙規貨幣政策，中央亦自能更有效調節資金的流向，確保公共財政更能取諸於民、用諸於民，不會如「水筲箕」般讓資源平白流失國外。

必須強調的是，促進經濟內循環並不等於閉關鎖國，回復到改革開放以前的狀態。它只是撥亂反正，扭轉過往中國過於依賴出口和美國市場，確立更均衡和具可持續性的經濟結構。關鍵是其實全球無論大小經濟體系，均需要具備一定的多元性和適應彈性，避免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籃子裡，確保產業能靈活適應外在環境的轉變。

強調內循環的另一關鍵意義，是並非所有產業皆適合對外開放。這除了涉及戰略安全的考量，更是針對弱勢產業的扶持和捍衛，例如過去對農業的保護便是重要例子。展望未來，尤其是當創新科技日益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，如何能確保國內自主研發創新，避免過度依賴外來投資、技術和市場，將是廿一世紀產業全面升級的關鍵步驟。

立足本土的競爭優勢

講完中國內地，回說香港本土的情況。在十多年來特區政府的政治掛帥下，中港融合已成為香港唯一的發展方向。一切產業規劃皆以大灣區為馬首是瞻，「向北望」成為金科玉律般的經濟教條。難得的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齊聲唱和，完全無視這種經濟邏輯的反智和弱智。

1990年，哈佛管理大師 Michael Porter 出版《國家競爭優勢》（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）一書，自此無人不對「知識型經濟」趨之若鶩。尤其是強調建立企業「群聚」（clusters）和「樞紐」（hubs），作為面向全球競爭的主要策略。一時間，全球湧現無數以矽谷自居的新開發區，直到逾30年後林鄭月娥的「北部都會區」，還是原用著這套老掉大牙的論述。

問題卻在於，從來沒有人認真看看 Porter 的原著，「鑽石模型」（Diamond Model）作為競爭優勢的核心內容，箇中涉及的四個主要重點包括：一、生產要素的條件（例如人力資源）；二、繁雜的本地消費需求；三、相關的配套及支援產業；四、具競爭性的企業經營環境及策略。

極為顯而易見的是：「生產要素的條件」有賴本地創新及創意人才的培養，輸入外地專才根本無補於事；在「向北望」的政治主旋律下，「繁雜的本地消費需求」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；至於「相關的配套及支援產業」，亦在地產霸權構成的成本壓力下，急速地淘汰或變得單一化；而隨著大集團壟斷程度的不斷提高，「具競爭性經營環境」更是無從說起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Porter 正是指向均衡和具可持續性的經濟結構，工商百業所必需的多元性和適應彈性，確保產業能靈活適應外在環境的轉變。和中國內地經濟如出一轍，香港本土同樣需要「內循環」，不能過於依賴「向北望」。這並非排斥中港合作，只是撥亂反正，避免將所有雞蛋放在同一籃子裡。

但在今時今日的政治大勢所趨下，還存在用腦袋思考的官員和學者嗎？

10. 承認「大政府」，妥善對待它

暮春三月，執筆之際，仍未知新一屆特首選舉的具體形勢，更無法測知誰將成為新的特首；唯一可以肯定的是，香港即將走完回歸首25年的艱難旅程，並迎接充滿未知的未來25年。我們同樣難以估計，香港仍會否舉辦盛大回歸慶祝活動；但可以肯定，現在應該是適當時候盤點一下，香港數十年來經歷的成功——和失敗經驗。

在我看來，要理解香港的根本特質——和問題根源，最重要的關鍵詞，並非「民主」、「普選」或「自治」等香港人最關心的面向，而是「小政府」和「大政府」——但它們絕非僅為客觀現實的描述，更加是誤解和錯誤的根源。毫無疑問，這些誤解和錯誤並非自然而然地形成，它們更多是刻意誤導和扭曲的結果，並令所有人仍一直沉醉在其夢中。

簡略而言，無論是回歸前後的港英或特區政府，再加上政經和學界的精英們，皆有意無意地塑造對「小政府」的崇拜和偏執，並視這為香港邁向成功的必然

鑰匙，更是東亞地區獨一無二的典範。但可惜的是，這既與客觀事實完全不符，而更重要的是，它令市民、以至政府本身，對政府角色產生了錯誤的期望。

「小政府」與事實不符

早在1997回歸之前，人們已對香港體制的特質爭論不休。以新加坡和李光耀為典型的東亞體制，當年曾大力宣揚「亞洲價值觀」，以說明從日本、四小龍以至中國崛起，是如何開創出與歐美迥異的發展道路。有為政府的大力推動，自然是箇中最為關鍵的特質；但港英作為一個殖民地背景的政府，對此卻始終多有忌諱。結果1980年前財政司夏鼎基拋出「積極不干預」（positive non-interventionism）——一個極度模梭兩可、近似廢話的字眼，為爭議打圓場，勉強敷衍了事。

對於持反對意見的人來說，「小政府」顯然與事實不符。早在1950年代起，香港已展開全球最大規模的公屋計劃；到了1980年前後，公營醫療服務和九年免費教育，亦已全面推展並覆蓋各階層；港英政府唯一能試圖辯解的，是它似乎沒有偏好發展某種產業——但當年新市鎮正如火如荼地建設，大量輕重工業設施拔地而起，難道那不全是政府規劃的結果嗎？

無論如何，當哈佛商學院管理學大師 Micheal Porter，在1990年出版《國家競爭優勢》（1990）一書，上述爭論也就應該壽終正寢。單看書名已可窺知，那根本是屬於國家、不是屬於企業的競爭優勢！沒有國家的積極介入，還那有競爭優勢可言！結果是在1997年，同是來自哈佛的 Michael Enright 挪用了相關論述，

出版了《The Hong Kong Advantage》一書，並被認為是回歸初期董建華「大政府」的藍本。

往後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詳：董治時代的徹底失敗，完全把香港人嚇壞了，繼續對「大政府」談虎色變。但究其實，無論是曾蔭權花費極巨的「十大建設」、梁振英的「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」，以至林鄭月娥投放上萬億元的「明日大嶼」——和還未算好賬的「北部都會區」等等，特區政府的「有形之手」一直愈伸愈長。只是在主流經濟學家的塗脂抹粉下，仍一直披著「小政府」的國王新衣，令市民誤以為政府在「無為而治」。

市民和政府的錯誤期望

長期以來，這種對「小政府」的錯誤認知和迷信，早已令香港人、以至特區管治班子本身，付上了空前沉重的代價。簡略而言，當政府意欲有所作為時，便強行辯稱這只是基本責任，不得已而為之；但在政府不想沾手的範圍，便可大條道理留給市場物競天擇、汰弱留強——到底什麼時候應該介入，什麼時候應該不介入？那純屬個人喜好和任意詮釋，根本沒有原則和理據可言。

當然，政府沒有介入的原則和理據，卻絕不表示沒有介入的因由。自前述2005-2022年幾任特首的事例已清晰可見，無論是來自文官或商界背景的特首，皆極花心思鞏固眾所周知的「地產霸權」體制，並且有系統地向特定的既得利益集團傾斜——然後復又通過尊貴學者的點評，辯稱這正是香港的「競爭優勢」所在。當這些花肖的謊言說上萬遍，自然就連當局者也深信不疑。

然而，這種利益高度綑綁的夥伴關係，似乎卻早已耗盡了政經學界精英的一切心力，以至在這個分贓遊戲以外的所有範疇——無論是中產或基層切膚之痛的民生議題，既得利益「食老本」以外的一切產業願景，以至香港作為一個城市的基本軟硬件設施——顯而易見，並非指那些如泥牛入海的「大白象」工程，只是與現代化大都會相應的基本環境及生活設施——通通皆一於好少理！任何沒有暴利前景的議題，特區政府大概連政策研究也懶得去做！

這大概亦已充分解釋，兩年來香港對應疫情的策略，為何總是後知後覺、慢人一步？總是要不斷承受沉重的教訓，在錯誤中繼續錯誤，然後又再繼續錯誤，不到最後也無法如夢初醒？原因無他，只因作為一個所謂的「小政府」，當然理直氣壯地只懂得「頭痛醫頭、腳痛醫腳」——試問又怎可能及早未雨綢繆，對各項社會經濟議題率先作出評估和準備呢？

至於一般市民呢？同樣由於對當局極度缺乏信心，反而在某個層面上和官員高度契合——他們已不再指望政府錯而能改、與時俱進，反而只希望它「少做少錯、不做不錯」！在過去兩年已清楚可見，大部分市民皆在防疫上自求多福，除了極少數的達官貴人外，便不見如歐美般的抵制抗疫情緒。但弔詭的正正在於，這反而造成當局麻痹大意、錯判形勢，最終導致醫療體系和設施完全超出負荷，染疫市民還不又是留在家裡各安天命？

創科神話延續「小政府」謊言

在「大政府」的既成事實下，拜托請別再去爭論到底政府的大小了。我們更應在承認「大政府」的前提下，認真審視它在不同社會經濟範疇的角色。毫無疑

問，「大政府」絕不等同於萬應靈丹，它絕對有可能是致命毒藥——但亦正因如此，我們就更有必要事實求是，認清「大政府」的現實和本質——它到底什麼時候在維護、而非踐踏公共利益？

在此借用美國政治學家 Peter Evans 的經典論述，指出二戰後經歷了去殖民化的發展中國家，新興政府往往在經濟發展中扮演積極角色。但部分只一味搜刮社會累積的財富，汲汲於填滿統治集團的倉庫，Evans 稱之為「掠奪型體制」（predatory state）；稍為有所收斂、或只間中上下其手的，可稱之為「尋租型國家」（rent seeking state）；至於那些能提供多元和開放環境，促進社會經濟穩定和均衡發展，真正能夠做到藏富於民的，方可稱之為「發展型國家」（developmental state）。

	小政府	**大政府**
有限政府	誘導型國家 (積極不干預？)	發展型國家 (亞洲價值觀？)
無限政府	尋租型國家	掠奪型國家

源於：Peter Evens (1995).

展望未來，當政府將資源大幅投放在創新科技，財富轉移的速度將較大白象工程尤有過之。而那既是一般市民更難以參與和監察的神秘範疇，亦是管治班子將責任轉嫁、延續「小政府」謊言的尚佳場域——政經學界精英繼續佯作無知，一切問題交由電腦運算程式，藉大數據和人工智能解決好了！公共資源最終流向了那裡？管治和決策效能是否真有改進？抑或只是狼群披著的羊皮？唯一可以肯定，那將是決定未來25年香港命運的關鍵[註一]。

註一：　詳見本書九章。

11. 市場是另一個「想像的共同體」

相信在香港長大的朋友，求學時期都必定讀過「石峽尾大火」的歷史。黑煙籠罩整個木屋區的照片，相信大家至今仍歷歷在目。這場發生於1953年聖誕的火災，燒毀木屋超過2,500間，導致50,000多名災民無家可歸。港英政府為了安置大量災民，遂開始興建七層徙置大廈，是為香港公屋政府的起源。

想像的「小政府」和「大市場」

不過人類學家 Alan Smart 在2006年的著作《The Shek Kip Mei Myth: Squatters, Fires and Colonial Rulers in Hong Kong, 1950-1963》中，卻活演了一場經典的「踢爆」秀，指出所謂「石峽尾大火」的論述，只是港英政府自編自導的一台戲！用以合理化日後被稱為「積極不干預」的殖民地政策，力圖解釋一個奉行「放任自由」(laissez-faire) 經濟哲學的政府，為何「被迫」大規模介入基層住屋問題。背後其實隱藏著工業資本「圈地」(enclosure) 的需要，以及控制官地作為政府主要收入來源的考慮。

這故事不禁令我想起同為人類學家的 David Graeber，在其名著《債的歷史：從文明的初始到全球負債時代》(Debt: the First 5000 Years，2011) 中，同樣大玩「踢爆」遊戲。他開篇便提到一個大家耳熟能詳的故事：在原始社會中，我們的祖先透過「以物易物」(barter) 進行交易，你拿十斤橙來和我換五斤蘋果，我又拿三斤橙去和他換一斤米，諸如此類……構成極大的配對困難和極低的市場效率。聰明的祖先於是發明了貨幣，由此亦標誌著市場經濟的誕生。

Graeber 指這個最早來自阿當・斯密《國富論》（The Wealth of Nations，1776）的故事，現已成為所有經濟學教科書的基本內容。但就從來沒有任何信史或考古證據，能證明「以物易物」曾在某遠古時空廣泛存在過。而在資本主義出現之前的上中古時期，貨幣普及和廣泛流通使用的程度，亦遠低於我們作為現代人的想像。由此意味關於市場經濟起源的「歷史」，只是經濟學家杜撰出來哄人的神話，意圖證明金錢世界的必然性和必要性。

假如「石峽尾大火」是個關於「小政府」的管治神話，則「以物易物」便是用作支撐「大市場」的學術神話。兩者其實異曲同工、相輔相承，亦是香港中小學課本的常見內容。

建構金錢和市場的神話

史學家 Benedict Anderson 曾在《想像的共同體》（Imagined Communities: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，1983）一書中，指出由於印刷術和書面語的普及，以及傳播媒體的廣泛流通，令多元混集的族群得以凝聚，構建出現代國族主義的身分認同，但這些國族身分只是「想當然」的存在。「想像的共同體」一詞，遂成為對國族主義批判的有力武器。對天朝帝國強烈排拒的香港人，對這名詞自然不會感到陌生。

當代大熱的另一史學家 Yuval Noah Harari 在《人類大歷史》（2014）中，舉一反三，進一步指現代智人通過語言和認知能力的建立，在過去數萬年搖身成為雄霸地球的物種，要訣正是建構各類能凝聚群體意識的神話，形成異常強大的集體精神力量——民族主義固然是引人入勝的故事，宗教信仰又何嘗不是成功的例子？

推而廣之，人權、自由和民主的普世價值、金錢、貿易和市場無遠弗屆的力量，同樣是人類建構出來的現代進步神話。正如 Harari 指出，在過去絕大部分的歷史時段，金錢往往會被視為萬惡之源，借貸操作就更是惡中之惡，高利貸是不容於社會道德的劣質行為；但到了當代的金權資本主義世界，這些觀念和論述卻被徹底扭轉過來，而銀行和信貸體系正是故事的主角，構成了點石成金的新魔法力量。

不難想像，阿當・斯密正是歷史上說故事最成功的人。

產業結構單一化的惡果

然而，隨著當代經濟危機的不斷加劇，特別是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之後，人們對金錢和市場的信仰，已在不同程度上有所動搖，只是苦無出路。在英國工黨郝爾彬和美國民主黨桑德斯的冒起，均是資本主義社會前所未見的現象。反倒回到我們的香港，自從1980年在《選擇的自由》（Free to Choose: A Personal Statement）一書中，被 Milton Friedman 奉為全球最自由市場體系，自此便一直沉醉在這美妙的神話中，久久無法蘇醒。

顯然易見，這個神話為香港帶來了巨大的益處，但同時也埋下了極大的危機。其中之一，是我們愈來愈傾向採用單一的標準——即價格機制，來衡量所有經濟活動、甚或是一切社會關係的價值。我們愈來愈專注於最賺錢的行業和產品，其他的社會經濟需要一於少理，因為彷彿只要有錢，餘下所需的都可以用錢買到。

因此，我們的城市便愈來愈專注於金融，那是單一最賺錢的行業。若要讓更多人同時賺最多的錢，我們則選擇了旅遊業——特別是專門接待大陸旅客的業

務。因此，我們的社區和街道可以什麼也沒有，彷彿只需要有金舖、藥房和電器舖便足夠。自2003年沙士後內地開放港澳個人遊，17年來我們便一直財源滾滾，換來的則是經濟和產業結構急劇單一化。

新型肺炎對全球造成沉重打擊，而香港過於依賴內地經濟、過於依賴單一產業的惡果，自然亦以倍數計的放大出來。不但暴利行業在一夜之間消失了，連帶我們口袋裡即使有錢，卻連最基本的衛生用品——口罩、消毒和清潔用品，也不一定能夠買得到。尤記得農曆新年假期之後數天，新鮮蔬菜和肉類供應亦一度成疑——難道只要口袋裡有錢，我們就真的三餐無憂？

唯一「背馳」的是香港股市

在經濟危機不斷加深之際，唯一出現「背馳」的是香港股市，竟較年前仍有不少的增幅——這反映我們的經濟基調仍然健康？我們的城市長遠仍甚具競爭力？抑或只是在中港融合的趨勢下，金融市場已完全脱離本地實體經濟，賺錢和蝕錢都愈益和本地產業和民生無關？

既然香港金融業的服務對象，只是遙遠和未知的想像的共同體，我們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，起用經濟專家駱惠寧作為西環的新當家，主要目的正是要穩住中環的金融中心。在一國兩制久延殘喘之際，仍讓香港長期累積的故事力量，繼續發揮支撐內地經濟神話的奇妙作用。這一切一切，已和我們距離得愈來愈遠；而這個香港，也讓我們感到愈來愈陌生。